

## · 经典研究 ·

河洛文化视域下《黄帝内经》中自然观探析<sup>\*</sup>陈曦 李保林 宋朝功<sup>▲</sup>

**摘要** 《黄帝内经》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黄帝内经》的医理核心内容,也是其哲理的重要体现。《黄帝内经》的成书背景与河洛地区文化的发展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其自然观的形成也融合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探索《黄帝内经》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不仅可从文化角度为研究其文理、医理、哲理提供新的切入点,也可弘扬河洛中医药文化。

**关键词** 河洛中医药文化;《黄帝内经》;自然观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为《内经》)作为一部中医的传世经典,其学术思想是后世中医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理论源头。《内经》在阐释生命科学奥秘时借鉴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元素,构建的医理体系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医哲融合是这部巨著的重要特征。观其源可以知其流。对《内经》中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的深入挖掘,不仅有利于对中医理论的正本澄源,也利于从文化视角推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与发展<sup>[1]</sup>。笔者从《内经》成书背景出发,为探讨其与河洛文化的渊源,以自然观为切入点,在河洛文化视野下探索先秦时期哲学思想与《内经》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深刻挖掘《内经》的文化价值,丰富河洛中医药文化内涵。

## 1 《黄帝内经》成书背景与河洛文化

《内经》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未有明确定论,学术界对此也有诸多讨论,但是以支持先秦至西汉时期成书说的学者为多<sup>[2]</sup>。本文也将从多角度、多学科将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探寻《内经》成书背景,发现其文化脉络,有利于从文化背景出发,探索《内经》的思哲来源,进一步对《内经》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挖掘。

### 1.1 《黄帝内经》成书背景 在史料文献的记载方

<sup>\*</sup>基金项目 2023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No. 2023-YYZD-14); 2023 年度河南省医学教育研究项目(No. WJLX2023212)

<sup>▲</sup>通信作者 宋朝功,男,医学硕士,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中医药教育。E-mail: scgdoctor@163.com

· 作者单位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面,现存的考古文物、史料文献对于《内经》的记载很少。最早见到《内经》一名,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的“医经七家”。但是从其成文内容、文字气象上可以发现《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跨度应该较大。

《内经》的中医理论有明显的扁仓医学学术特点。司马迁所编著的《史记》中为扁鹊与太仓公作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扁仓医学的繁荣与传承。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也显示出扁仓医学学派对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内经》中的部分中医理论与医技也可以看到扁仓医学的学术特点。在学术思想上,有学者对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及其他传世文献内容进行对比,发现扁仓医学“通天”的学术思想在《内经》中亦可窥得一二<sup>[3-4]</sup>。例如《素问·病能论》云:“《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有学者考据其中提到的《上经》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也有著录,天回汉墓出土医简亦可佐证。《内经》在继承扁仓医学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进一步进行了医学化转换。《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讨论了人的生理与天地自然之相应;《素问·金匱真言论》言“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指出了病理变化与天地息息相关;《素问·五常政大论》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提出了疾病的治疗亦需与自然天地相顺应。《内经》中术数理论也体现出“守数精明”这一扁仓医学的主要特征。在诊法方面,《史记》中就曾记载仓公以颜色诊察疾病,与《内经》的五色诊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特色治法上,针灸应用是扁仓医学的重要诊

疗手段,其部分记载与《内经》内容可相互参照。因此,起于先秦、盛于秦汉的扁仓医学对《内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医名家龙伯坚、任应秋先生结合考据相关经典及史料,认为《内经》成书于先秦至秦汉时期<sup>[5]</sup>。

《内经》在文化特征上与先秦至西汉时期文化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宋·程颢在《二程全书》中云:“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也有学者评价本书“闻气坚削,如先秦诸子”“绝似管、荀”“又类鬼谷”<sup>[6]</sup>。当代学者从文化特征上对比发现了许多《内经》中脱胎先秦至西汉时期文化的内容。任应秋先生将先秦时期经典与《素问》篇章的韵文作对比,以此为据认为《内经》中诸如《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等篇章很可能出于先秦<sup>[5]</sup>。著名中医史学家马伯英先生曾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一书中引证《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内容与《内经》对比异同,亦认为秦汉时期是《内经》最有可能的成书年代<sup>[7]</sup>。钱超尘先生从《内经》文本的文化特征、文字音韵角度支持《内经》成书于秦汉时期这一学说<sup>[8]</sup>。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根据秦汉时期计量单位等角度考据《内经》成书年代。张维波等人以《灵枢》中记载的消化道长度为例,发现《内经》中部分人体解剖的长度依照商尺换算,接近于现代医学的解剖标准<sup>[9]</sup>。

综上所述,《内经》是一部吸收了先秦经典学术成果的恢宏的生命科学著作,是中医学史上的扛鼎之作。不可否认,里面的部分篇章也经历过后世医家的增补、修订,但是战国、秦汉的文化在《内经》的医、文、哲的内容上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1.2 《黄帝内经》与河洛文化之联系** 河洛文化是指发源于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即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地域性是河洛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河洛文化是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明珠。著名学者许顺湛曾高度评价河洛文化是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内容的中原文化的文化核心之一。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河洛文化存在的时期非常久远。以河南地区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出土的众多考古文物中,不仅可以看到石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及生活器具,还有部族文化生活的诸多证据。这说明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原河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古老的文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里,可以看到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昌盛<sup>[10]</sup>。

中原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夏、商、周三个朝

代的先民在此建立了早期国家雏形。《史记》有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位于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展现出夏商时期青铜文明的辉煌。《逸周书·作洛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平王东迁洛邑,以及周朝时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昌盛的国力,无不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原地区已然成为经济、政治的中心地带,中华文化也在河洛地区开始孕育、成长、兴旺<sup>[11]</sup>。

河洛地区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非常适合文化的产生与交流,故而河洛文化既可以不断向四周扩散,也可以兼收并蓄不同地域的文化精华。春秋战国时期,不断的结盟、战争、迁徙等政治活动带来的文化碰撞,以及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带来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了河洛文化包容性、传播性等特征,这也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因素。

《内经》成书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在这一阶段河洛文化也经历了发展高峰并逐渐走向成熟。这也决定了《内经》在成书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河洛文化视域下对《内经》展开研究,有利于从整体、纵横方面做宏观研究,加深对《内经》的理论研究深度。同时,《内经》的成果可作为河洛文化的一个单体,因此,对《内经》的研究也是对河洛文化的微观研究。

因此,在河洛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内经》研究,无论是对河洛文化研究还是对《内经》内容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2 《黄帝内经》自然观与先秦时期哲学思想之间的渊源

自然观属于哲学术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其概括总结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中对自然的本质、自然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sup>[12]</sup>。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逐渐成熟的农耕文明是河洛文化的底色。农业生产、生活在本质上非常依赖自然的力量,需要恪守四时,顺应自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自萌芽开始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碰撞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对其的影响。这种自然观对《内经》论述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科学的关键问题也有很大影响。《内

经》从医学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阐发,也可以看作是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思想的补充<sup>[13]</sup>。《内经》中自然观主要是从“人与天地相应”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人如何生于自然,人与自然相应以及顺应自然等内容。“人与天地相应”是《内经》中自然观的重要核心内容之一。

**2.1 敬畏自然** 《内经》中的“天”包含很多含义,但主要是指自然及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如天空、天气、天体等。从《内经》中关于“天”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自然怀着崇拜与敬畏之心。《素问·六节藏象论》云:“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天元纪大论》亦曰:“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自然万物的起始,是化生万物的本源。天地之间,阴阳相感,不断分化积累化生出宇宙中的无穷事物。

古人对于天地、自然的崇拜,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也可以找到相参照的内容。道家观察自然,其倡导的“道论”“气论”在《内经》中都有明显的相通之处。《老子·道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自然是万物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生产必须依赖自然。“道法自然”也强调了自然的力量,强调人们应该崇敬自然。儒家同样推崇自然,《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秦儒家的许多概念也都来源于自然,例如《论语·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以山水阐释“智”“仁”;又如《荀子·宥坐》指出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孔子论水,以水阐释“德、义、智、勇”,显示了儒家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推崇。

**2.2 人本自然**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地相合的产物。《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生于自然,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也和自然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刺节真邪》有云:“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体现在《内经》对生理病理认识、疾病诊察、治法和养生等方面的论述上。

在对人体脏腑生理的认识上,藏象学说带有明显的人本自然的思想。《素问·六节藏象论》详细论述了脏腑气血与四时的联系;《素问·金匱真言论》将各脏腑的生理变化与自然变化相应;《素问·八正神明论》

《灵枢·岁露论》说明月的圆缺对人体气血盛衰的影响。

在诊法上,《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玉机真脏论》论述外界环境变化对脉象的不同影响,以及在诊脉时要注意时间、季节的变化。《素问·三部九候论》中以“天地人”三才对应人的形体、经络,其中详细论述了七诊与三部九候合参诊察疾病。

在病机方面,《素问·藏气法时论》系统论述了四时、五行与脏腑病机变化的规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直接指出了百病的发生与燥、湿、寒、暑、风、雨六种气候等因素直接侵袭人体有直接关系,以及百病的症状变化与四时之气的变化相关。在针刺、用药、治则等治法以及养生方法上,《内经》也有许多与自然相关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人与天地相应”的人本自然的思想,贯穿于《内经》的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之中。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先秦诸子们探讨的重要问题。道家学说认为万物的产生与气关系密切,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人也是在这种气的阴阳交感过程中产生的,这与《内经》中关于人之起源的论述类似。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通,人要与自然相融合来获得境界的提升,正如《庄子·刻意》所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而德全而神不亏。”

孔孟儒家思想中,倡导人借助自然来修身养性、治国治学,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在道德层次上,先秦儒家将自然赋予更高级的精神品质,以物喻人来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宪问》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荀子·法行》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论语·子罕第九》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先秦儒家在认识自然、观察自然、赞美自然时,往往从人的角度出发,这种人本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承天道归人道,追求与自然交融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精神,实现提升自我、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

**2.3 效法自然**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由于人是自然的产物,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以及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内经》中关于疾病的治疗、健康

的保养都遵循顺应自然这一原则。正如《素问·气交变论》所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内经》指出治疗疾病时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是顺应自然的具象性表现。《素问·异法方宜论》详细论述了东、西、南、北、中五方地域地理特点之不同，而自然环境的不同使得居民体质和患病特点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治疗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治法和特色。五方的治疗特色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

“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素问·疏五过论》），可见临床中应顺应四时施治，例如《内经》中在论述治疗原则时提到“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则反，此其道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在论述刺法时提到要“法天则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论》）。《内经》中提到的种种因时制宜的治病原则和方法到今天对中医临床都有着深远影响。

养身防病是《内经》医理部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论》），若违背了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就会造成百病丛生。在如何保持健康上，顺应自然是核心原则，正如《素问·四气调神论》所云：“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素问·上古天真论》论述了养生要像“上古之人，其知道者”一样，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去保养自己的“形”与“神”，做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才能达到一种“形与神俱”的状态，最终“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道家讲人道提倡取法天道。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自然规律不可违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庄子主张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与人不相胜也”即人与自然是和平相处，遵循自然的规律法则，修身养性。

儒家也强调要遵循顺应自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

谐关系。“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仁者之心对待自然万物，顺应自然也是仁德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类要明辨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 3 结语

本文在河洛文化背景下，探索先秦文化与《内经》中自然观的联系，重温中国先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有利于后世医家加深对《内经》的认识和对其文化价值的挖掘。中医学者除了从天人合一中把握中医生命科学理论，探索生命、认识疾病、诊察疾病、保养健康外，还要从天人合一角度把握中医生命哲学理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养护生命，从而为弘扬以河洛中医药文化，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 参考文献

- [1]王庆其,田永衍,赵心华,等.《黄帝内经》文化专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12.
- [2]李硕秋.科学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2019.
- [3]顾漫,柳长华.天回汉墓医简中“通天”的涵义[J].中医杂志,2018,59(13):1086-1091.
- [4]杨恺,柳长华.秦汉时期扁仓医学传承脉络及学术思想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9):4908-4913.
- [5]孙非.《黄帝内经》年代学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8.
- [6]张登本,孙理军,李翠娟.《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J].中医药文化,2018,13(5):37-43.
- [7]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06-216.
- [8]钱超尘.章太炎先生论《黄帝内经》结撰于汉代[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3):893-900.
- [9]高也陶.《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新议[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21(2):27-30.
- [10]程有为.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J].中原文化研究,2023,11(1):45-53.
- [11]张新斌.先秦都城与中原区域文化的考古学观察[J].中原文化研究,2019,7(6):39-44.
- [12]刘清.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之简论[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15):37-38.
- [13]张其成.中医生命哲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9.

(收稿日期:2024-01-09)

(本文编辑:金冠羽)